

文 革 博 物 馆 专 集 (三 十 一)

中外古今的文人雅士、高官巨贾，多欢喜标榜自己志在田园之趣、向往山林之隐。其实，那是他们锦衣玉食、华夏雕车的日子过久了产生的错觉。世外桃源的生活我曾领略一二，深知个中滋味。我们干校所在的茶陵县虎踞山，地处湖南和江西两省交界，罗霄山的余脉青翠高耸，直伸到这里。山脚盘绕着碧绿如带的米江，江

水清澈见底，江岸绿草茵茵。干校就在江边，蓝天、红土、茶园，如诗如画；丘陵下面白雾缭绕的村落，如梦如烟。可惜，幽美不等于富庶，温饱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我想，如果陶渊明过的是三餐不继的日子，他一定会把东篱下的菊花连根拔起，改种南瓜和扁豆的。

◇白米饭红辣椒

这里的农作物除水稻以外，还有苕麻、姜、花生等经济作物。就是说，口粮之外能换钱的东西也不少。也许是政府低价统购的关系，当地的老乡都很穷。他们住在半砖半土坯的屋子里，把墙上开几个方洞、竖起三、四根木棍就是窗户，既不遮耳目、又不挡蚊蝇。室内一床、一桌、几只板凳而已。家家烧柴举火、燃油为烛，熏得四壁漆黑，白日也不能读书。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身着黑色土布衣裤，四季皆然，女孩子不到婚礼不能穿红着绿。农民们从小劳作，风里来雨里去，人人皮肤粗黑、身材矮小。所以，北京来客在他们眼中，个个都好看。

他们日出而作、日入方息，除了稚童看不到闲人，仍然清贫得连婚礼都热闹不起来。平时走在路上的几乎只有两种人：荷重的挑夫，迎亲的小队。挑担的或男或女，几个人一排，每人一根短短的竹扁担，两头坠着百十斤重的稻谷等物，按着同一个节奏，迈着扭秧歌似的步子，无言急行，一走几十里，其整齐划一就象一队大雁，当然没有那么飘逸。迎亲的方式也很别致：每队不超过十个人，一人擎着一把伞。新娘就在这中间，因为不着凤冠霞帔，故尔生人莫辨。无论多远，都是徒步而来，路上遇见人，他们会害羞地以伞遮身。人们只能对新娘的容貌产生遐想，绝不至于对她的嫁妆做出不切实际的估计。

当地农民嗜食辣椒。我看见他们手里的饭碗，白米饭上只铺着一层红辣椒，一边吃、一边吸着凉气，头上渗出汗珠。关于吃辣椒，营养学家说它富含维生素；老百姓说它可以驱散风寒；毛泽东又说是革命性的标志。其实，哪一种蔬菜的维生素都不少，辣子吃多了，会刺伤胃粘膜、引起痔疮……；散风寒，有的是灵丹妙药，辣椒的位置大概在“解名尽处”；而毛老爷子餐桌上的辣椒，是和大碗红烧肉一起端来的。我想，米水江畔远离精神和物质文明的人们，世世代代过着同样的日子，单调、乏味使人麻木，除去辣子，大概少有其它的东西能给他们以感官刺激了。

◇赶集

那里财富最集中的地方，恐怕得数千校附近农村的供销社了。它们没有橱窗，看上去多半像是一所普通民宅。临街墙上几个笨拙的墨笔字告诉人们：这里贩卖民生必需品。店里是泥土地。未曾装饰过的木制柜台的边沿，被往来的农民兄弟磨擦得乌黑发亮。室内散发着煤油、烧酒和醋混合的味道。那气味之怪，足以使清醒的人眩晕、使迷糊的人振奋。里面的商品虽不应有尽有，倒也种类繁多，农具、五金、服装、炊具等等，每类都有几样，只是货色单一，无可选择。就像那个年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内容一样，全由政府规定和设计好了，个性一说与反叛同义。

干校校部所在的虎踞山，离最近的长途汽车站有十几里，从那儿到茶陵县城大约六十多华里，四排房就更远了，对江前村的村民来说，去一趟县城简直是生活里划时代的里程碑。就连我们这些小五七战士到米江茶场参观时，都被当做中央首长，也就难怪村子里的老乡围观我们了。在他们眼里，干校的人不但长相好、穿得高级，而且人人是阔佬。尽管真正的高干为数不多，一般干部并不富裕，我们还是很有购买力，因为虎踞镇集市上东西比起北京来，真是太便宜了。我记得，农民自产自销的西瓜一分钱一斤；鸡蛋三、四分钱一枚；鸡鸭鱼都是活的，一两块钱就能开一次荤。所以，一待干校的管理稍稍松弛，那些住在村子里可以自己开伙做饭的人

，便瞪着饥饿的眼睛来赶集了。

商品经济的规律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起作用。只消三几次开市，全部果菜肉蛋的价格就开始成倍上涨了。农民买不起，一骂干校的人太有钱、二骂摊贩不顾乡谊；干部们也愿意集上的东西永远价廉物美。大家一起吵着讨价还价，集市上乱成了一锅粥。

◇杀生

村居的日子也有趣事，比方看老乡杀猪：操作的时候，屠夫先将一把牛耳尖刀叼在嘴上，再同他的助手慢慢把未经捆绑的待宰之猪，引向一个二尺来高、顶部下凹的木架子。到了那儿，两人一前一后、猛地抄起猪腿、把它掀翻在架子上。那可伶的猪来不及挣扎，已经仰面躺在三边无着的凹陷里。说时迟、那时快，屠夫早已利刃在手，对准猪的喉咙只一刀，顿时血涌如注。架子上的猪四脚乱蹬、却动弹不得，徒然发出凄厉的嘶叫、声闻数里。

一会儿，猪安静下来了，屠夫过去用手握住翘起的猪嘴、转动猪头，把血挤净。然后在一只猪脚上，用刀割开一个小口，将一根一米左右长、手指粗细的铁棒，从伤口插进去，慢慢地直伸到猪的肩颈，并以那个伤口为轴，使铁棒在猪皮与猪肉之间做扇骨式穿插，造成无数通道。这时，屠夫放下铁棒，两手撑开猪腿上小伤口，把自己的嘴贴上去，用力吹起气来。他们个个体魄强健、气力惊人，不几口那百多斤的猪就皮肉分离、胀得象汽球了。随即，在观众的喝采声中，屠夫就着木架、持刀把猪皮从肚子上豁开，再一刀一刀将猪皮完整的剥下来。我计算过，剥一张猪皮只需要十一分钟。加上先前的动作，至多不过半小时。以后我在别处，再也没有见过身手这么矫健的屠夫。

虎踞镇上的屠宰场是杀猪的所在，没想到，杀人也在这一带。那年头，据说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农村小农经济的残余和干校的反革命分子，都是镇压对象。虽然不是抓到就杀，为让他们服服贴贴，惩一儆百却是必须的。

抓“五·一六”运动开始后不久的一天，全体干校人员无论老少，都列队来到虎踞镇，会同当地公社社员开了一个批判大会。会上的主角是两个散发反动传单的青年农民，记得他们的年龄一个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二岁，除去思想反动之外，没有其它罪行。那个会也许该叫做公审大会，是拿政治犯当作刑事犯来处理的。台上若干人等慷慨激昂地声讨了一番之后，当地公安局的人宣布，判处这两个年轻人死刑、立即执行！

果然是立即执行：他们被拖出会场不一会儿就传来了枪声，刑场就在旁边的山坡上。枪声一落，领导就命令我们排队前去观看，名曰“受教育”。到那儿一看，只见一个满脸是血、陈尸地下；另一个，子弹打掉了他的左下颌，头上没有血，惨白的脸上缺了一大块。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确实感到了恐惧。

当时谁都知道，要不是干校在大抓“五·一六”，那两个青年罪不至死。

五、抓“五·一六”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林彪等人下了大决心搞起来的。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群众组织，虽有左与右，造反与保皇等区别，但异口同声，大家都说自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不料，后来有传言说：一个叫做“五·一六”民间组织，旨在反对这个史无前例的运动。据说，那是个秘密团体，不仅暗中发展成员，而且单线联系。这个反对派的名称取自《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的发布

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真是极大的讽刺。对此，毛、林等人自然不能坐视，相继下达了彻查的命令。毛的话是最高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林彪那时还是副统帅，他的话一贯夸大其辞、不留余地：“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他们这么一讲，谁人还敢怠慢？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况且，文化大革命搞到这会儿，很多人都学会了利用政治运动泄私愤、图报复；这还是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好机会。把大批干部集中到干校来，原本也有便于整人之意。于是，北京下来的大队人马，行装甫卸、喘息未定，“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 “社会的良心”

那是个“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时代。加上敌人都在暗处，斗争扩大化简直名正言顺。运动之初，谁也不知道这个国务院的要害部门里，有多少“五一六分子”，只听说始作俑者是一位女士，她曾在那个隐密组织的发祥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过，“所以是她把‘五·一六’引进来的！”然而，由于他们单线联系缘故，这个阴谋集团最终发展成了多么大的规模，就谁也不知道了。破获他们的第一个方法是“顺藤摸瓜”：让已经暴露的“五·一六分子”指认同党。这事说着容易，做起来却非常之难，很少有人痛痛快快揭发检举的。

于是，当局开始逼、供、信了。通常的做法是先开批斗会，其规模依案情不同，有班组、连队、干校，乃至游斗于全部各干校和在京部机关的区别。当年的批斗大会声势非常吓人。少数人利用这个机会官报私仇，平日无处宣泄的私怨，此时正好借题发挥；还有人混水摸鱼，趁机把别人拉下来，为自己升迁扫清障碍；也有人刻意表现自己，以示区别、免遭池鱼之殃；等等。虽然用心各异，却都不遗余力、一同朝着受难者落井下石。至于大多数的“革命群众”，他们并不知道个中底里。这个中央大部虽是官场，惯会因势利导的野心家倒还不多，多的是知识分子。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那个时期的良心是什么呢？是革命性、是斗争性，是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一呼百应。因为他们“受党教育多年”，因为他们早已“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一切悖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或事，都不被他们容忍。只要是党讲的故事，无论多么离奇他们都相信，没有人认为这是盲从，多年来的各项建设成就已经使人叹服。所以，在当时的道德观念、是非标准和社会气氛之下，对“阶级敌人”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是“很有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同样可悲的是，站在台上挨斗的人，囿于时代的意识形态，也或多或少的认为自己真的有错、甚至有罪，更加助长了批判者的气势。就是这样，心怀鬼胎的人兴风作浪、不明真相的人推波助澜，给惨遭历史愚弄、被揪斗的人造成了多么大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 逼、供、信

当局迫人就范的手段绝不仅止开斗争会，还有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虎踞镇上枪毙的那两个青年就是范例。散发反动传单即以死罪论，若是依例治罪，那相似的、更大的事情就算从轻发落，又能怎样呢？一九六七年，外交部管辖范围内出了香港“反英抗暴”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军国大事。当时的处理方案全是依照中央的意思定下来的，后来发现不妥，但是上头反过手来，把责任往下一推，说是“五一六分子”捣乱其间。这个罪过比发传单大多了，有关人员不仅得代人受过，还被追究莫须有的政治动机。

其它一切与时下行为准则不符的陈言往事，乃至派别之争，无一不能同本来模糊莫辨的“五·一六”行径扯上关系。按照“无限上纲”的推理方法，几乎所有“

有问题”的人，都够得上杀头或者坐牢的罪。所以，眼下的“逼、供、信”竟是“挽救、宽大和给出路”之举，被系于倒悬的人们，还得对党的“苦口婆心”感恩戴德呢。

当年，他们一面大批特批“资产阶级人性论”；一面利用人伦亲情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为了积累战果、邀功请赏，他们不惜使出杀手铜胁迫“拒不认罪、负隅顽抗”的不合作者——强迫落难者家属“大义灭亲”。社会上现成地有“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的“定论”；而且，人人认可的亲疏标准，首先不是血缘和私情，而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同时，与谁站在一起，直接决定着自己的命运。有了这么多重大的理由，“反革命分子”的家眷，“在党组织的启发、教育之下”，或为政治信仰、或为明哲保身，是夫妻的宣布离婚、是父母子女的宣布脱离关系，以示“划清界限”；定要等到对方“低头认罪，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才谈复合。这一着，不可谓不够毒辣，至此仍不屈打成招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钗头凤》

已经暴露的“五·一六分子”为数不多，不足以显示当局的手段，为了实现林副统帅“一个也不能漏掉”的意愿，还得在群众之中一一审查，把隐藏着的敌人一网打尽。其办法，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先确定一些嫌疑犯，对之进行明查暗访，威胁利诱，务使其名列他们的成绩单。大兴文字狱是常用的办法之一，而且作法之荒唐足以让朱元璋、康熙、雍正辈瞠乎其右。

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好发生在我父亲身上。有一个叫刘佐业的人，顶不住猛烈的批判就屈招了下来。为了分散头上的压力，他竟说我的父母是经他介绍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我父亲因无罪可认，自然态度强硬，专案人员就对他进行了彻底的搜查，父亲的笔记本也被没收了。那里面抄录了一些唐诗宋词，其中有唐婉致陆游那首著名的《钗头凤》，谁能料到这居然成了“他拒不交待问题的铁证！”在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会上，一个名叫王家骥的积极份子不知道是真的不懂、还是指鹿为马，郑重其事地对着几百个高级知识分子讲解道：就在不久之前，他写了这样一首词：“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乾、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瞞、瞞、瞞。”——一起首两句就是污蔑当前的大好形势；无法抒发内心的感受，所以叹息道“难、难、难”。词的下阙说“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分明是哀叹在革命的风暴摧毁下，四分五裂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然后，王家骥刻意把“角声寒、夜阑珊，”念成“脚步声寒、夜阑珊”，说这是作者在隔离审查期间，听着巡逻者的脚步声，不能成眠；他不愿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想装得若无其事、蒙混过关、所以要“瞞”、要“咽泪妆欢”。如此牵强附会，一定亘古未有。我父亲听了哭笑不得，却无人容他申辩；与会者个个噤若寒蝉，谁敢站出来指出这个天大的笑话？

我们茶厂连的小伙伴也都在场，因文化水平太低，散会出来有几个人竟然用钦佩的口吻对我说：“你爸爸的诗做得真棒呵！”我也没有读过那首词。这次大会之前，我一直希望父母的问题是误会了、搞错了。现在居然“有诗为证”，哪还顾得上佩服，只在心里暗暗叫苦：“原来他真的是‘五·一六’！”

◇界线

有一句名言叫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大概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而且正应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上。正面的反抗是毫不避让、据理力争。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做的：掌权者打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旗帜，陷我母亲于囹圄，我母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针锋相对、引经据典，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说辞，逐条反驳他们的诬陷。当权者无法自圆其说、又不肯认错，恼羞成怒，以势压人。结果，我母亲成了全干校被关押的时间最长的人。

我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到干校，至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五岁那年离开，一共在虎踞山住了十三个月。这期间，因父母关押，倒有八、九个月没有见到他们。而且，我都不知道他们被关在哪里。只有一次，我从虎踞镇供销社出来，远远地看见父亲，但是旁边站着看管他的人。我不能过去同他讲话，只能默默地看着他，也不晓得他看到我了没有。还有一回，我在路上碰见了妈妈，我不由自主兴奋地叫她，她也朝着我笑。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交谈，若是我走过去同妈妈说话，周围的人可能会向“党组织”告发，说我“划不清同反革命母亲的界线”，那样一来，我也许就成了小反革命了。直到我要走了，共产党当局才允许我分头去向父亲和母亲道别。

◇惹祸的胡子

那次运动被整的人中间，并不是人人都有“如山的铁证”捏在当局手里，收集整人的凭据，倒是颇费了他们点功夫。谁都知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故事，在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随意给人罗织罪名的恐怖之下，有些人设想得到自己的命运，心事一重、言行难免失态。正好给惯于察颜观色、捕风捉影者提供了立功的机会：有人紧张之中把革命口号喊反，成了“谁热爱毛主席我们就和谁拼，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谁亲”，有人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时候结巴了；有人在沉思中走路，撞到了柱子上；有人被点燃的香烟烫伤了舌头；等等蛛丝马迹，都成了犯罪的佐证。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那些日子里，使我“大长阶级斗争经验”的一件事是：一位和我同住四排房，向来性格开朗、名叫王和新的人，听说自己上了嫌疑名单，心绪烦闷，好几天没有顾上修整边幅。一日，全连开会，某领导声色俱厉道：有人不刮胡子，你想干什么，对现实不满吗？……我在下面听了大吃一惊：却原来胡子也与政治有关系！王和新终因几天未刮胡子凑够了条件，沦为“五·一六嫌疑”，多年不得翻身。

◇失态与扰局

人非草木亦非圣贤，如此精神摧残、政治迫害，前途无望、申诉无门，真正扛得住的能有几人？人们不得不遵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训：先屈招下来，稍卸重负，假以时日，伺机伸冤。当权者一见众人不耐折磨，纷纷屈打成招，不禁喜从中来。为了炫耀战功，就逼迫一些“交待了自己问题的五·一六分子”到大会上去现身说法，这样的会我参加过好几次。如何在台上“批判自己、教育别人，用本身的思想转变，来说明党的政策之伟大、正确”，都有规定的程式。说起来不外是自己怎样放松了思想改造，固执了一阵之后，终被革命群众的热诚所感化云云。

然而，千篇一律中居然出现了异数。一次全校大会，几个例行的自我批判以后，轮到了一位老者叫曹绵之，是个司长。看上去他的步履格外沉重、悔恨格外深切，上得台来，开口道：“我1936年参加革命……”，一言未竟，就开始嚎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非常失态。起初还能吐出片语只言，说是悔不该上了贼船，误了半世英名；以后就泣不成声、不知所云了。全体与会者都僵在那里，从他的哭声中品味他的忏悔。其实，他是在哭自己的懦弱：既无力反抗栽赃于他的恶势力，又不愿在这里自欺欺人，满腹冤情欲诉无门，阶下之囚何谈体面尊严？值此进退失据，又不得不有所表示之时，不哭何为？按照当时的逻辑，破坏庄严肃穆的政治气氛也是不小的罪过。那位司长先生怎么应付这一关，我就不得而知了。

痛极而泣本在情理之中，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在那样动则得咎的环境中，居然有人敢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对待政治运动。就在同一次大会上，老先生哭过不久，轮到一位名叫余德胜的“交待罪行”。这是一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中年男子，对于“曾经参加反动组织、与人民为敌”，余某毫无愧色。他站在主席台中央、手撑讲台、睁目扬眉，语音洪亮、口若悬河，大讲其“落水、执迷、醒悟和反戈一击”的过程。我还记得，在讲到揭发“同党”一节时，余德胜说：有些是老同志，一旦反党行径暴露，往日的革命功绩将全部作废；有些人年纪尚轻，罪证一定，前途全成泡影。每念及此不免心慈手软。但是，想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我就……。他在那里侃侃而谈，把散会的时间拖后了半个多小时。这哪里是“认罪发言”，简直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大家都看出余某的玩世不恭，一时没办法制止，只能听他头头是道的说着，无可奈何。天晓得，他根本不是什么“五·一六”，不过是被逼搅局而已。

还有的人，使用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反击法：利用他们宁错勿纵的方针，和当权者之间的矛盾，把那些整人最狠、叫嚣的最狂的人，当作“五一六分子”供将出来。这样一来，局面大乱。就连干校领导小组那个叫做屠孝顺的组长都成了“五·一六嫌疑”；各连队专案组成员走马灯似地更换；几乎每个连里都有“五·一六班”（从班长到全体五七战士都是“五·一六分子”或嫌疑）；全干校上了黑名单的人超过半数。“昨嫌紫蟒长，今怜枷锁扛”的丑剧一再上演。直弄得乌烟瘴气、人人不知所从。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亲耳听到两个管运动的领导谈话，他们说：搞到现在、大半年了，我们部里的“五·一六”组织，是叫“纵队”呢？还是叫“兵团”？都没有弄清楚。事实上，全国各地“清查五·一六”的运动都陷入了类似的困境。因为，“五·一六阴谋集团”之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事后捏造岂能周全？但是党不能错、政治运动不能停。就在他们为如何圆这弥天大谎而一筹莫展之时，至今为人钦佩、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出面了，只消一语便点破了迷津——不要在组织上纠缠，要抓思想上的“五·一六”！也就是说，周总理让他们像一九五七年抓右派时那样，思想有问题的，就可以戴上“五·一六”帽子；拘泥于其有无组织形式，反而会缩小打击面。

多亏了周恩来一展“雄才大略”，“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得以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全国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最大的冤案，而且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当权者，都曾参予其事，所以它也是唯一至今没有平反的大案。

六、保尔·柯察金

二、三十年虽说只是历史的一瞬，但这其间，人世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无可非议的事，如今听来简直匪夷所思。那些平凡的往事，现在说说，恰好能做历史的注脚。

◇双重标准

校部有一台热水锅炉，容积不过一立方米左右，是为五七战士们喝开水所设，烧的是煤炭。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锅炉，竟由四位月支两百元以上的高薪老先生伺候着。（干校人的平均工资大概不到一百元）有人计算过，连工带料一壶开水的成本大约是五角钱。而我等“小五七战士”，每月只挣十五元钱。虽然我们去打开水时不用交钱，但烧水的费用仍是民脂民膏。却原来，当局者算的是政治账：那几位“锅炉工”，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烧锅炉的

意义在于，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思想；体现了党的“给出路”的政策。至于指导一切革命活动的大理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这一条此时就不再提起了。

在四排房的时候，“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开始不久，出现了一位勤奋的拓荒者。他利用早晨上工前、中午休息、晚餐后的空闲和周末假日——几乎所有属于他自己支配的时间，抡着大锄头把驻地周围杂丛生和寸草不生的空地，深深翻过，整理成菜畦。我们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晒成古铜色的脊背，在烈日之下挥汗如雨，义务种菜给大家改善伙食，都很敬佩。而且，他一向沉默寡言，对运动并不积极。不料，连里的领导找他谈话了，不但没有表扬这个志愿劳动者，反而说他“消极对待运动”。因为当务之急“不是改善伙食，而是改造思想”。领导还着重提醒他：“不要放弃政治学习。”至此，不但荒地不能开垦了，他还得费尽唇舌，“向组织说清楚”自己这么做的“真正动机”。并且立即改弦更张，与多数人的步调一致：投入到运动中来。

有些人不热爱劳动并非出自政治原因，而是纯粹的好逸恶劳。一位高干勉强下来干校，他说什么也不下地劳动，称病卧床不起。连里经常派人给他做工作。一日，这名高干被人逼急了，脱口道：“我接到通知，总理让我回北京去汇报工作！”故事传开，人人失笑。因为他老先生早就赋闲靠边站了。

还有一位女士，因膀胱炎这种小病，住进了百里之外的一所军队医院。在那里一再拖延，病实在是好了，医生再一次请她出院，她怒道：“我是一秘夫人，你们要对我的健康负责！”这话就连部长夫人说出来都嫌牙碜，何况，她丈夫的职位离部长还差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呢。（进城之初封官许愿时是论功行赏的——参加过长征的老共产党，才能做部长。而那位一等秘书先生的“革命生涯”，是从七·七事变那年才开始计算的）诚然，只有自认政治上没有问题，官场又不得意的人，才敢拒绝劳动改造。

◇夜送陈家康

真正的病人若是政治上也出了问题，可就不能那样“以此为由，向组织上讨价还价”了。曾经做过驻苏联大使的副部长陈家康患有心脏病，这时他又在政治上出了毛病。所以，没能去医院治疗，而是在干校接受“隔离审查”，就住在校部。一天傍晚，副部长先生被专案组的人押着，手提暖水瓶去灌那高成本的开水。一时心脏病发作，摔倒在地、就此解脱。干校原本缺医少药，更无医疗设备，只能目送这位为共产主义辛苦了大半辈子的老革命去见马克思。

陈家康好歹是个人物，他的死得报告中央。所以，尸体不能就地掩埋，要运到“一秘夫人”住过的医院冷冻待命。这可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等闲之人不能担当。正值干校遍地“五一六”之秋，校方居然派不出合适的人做收尸运尸的工作。想来想去，只得到我们茶厂连来要人，我也去帮了一把。过去我并不知道陈家康其人，待我见到他时，他已经静静地躺在一块床板上了。我看他，身量不高、上唇留着小胡子、皮肤已然脱了血色、样子倒很安详。有人指挥着我们，在他身上覆以自己的棉被，四边用木条压住，连被子一起钉在床板上，为的是应付运送途中的颠簸。然后，把他抬上一辆卡车，连夜运到醴陵的军队医院。

多年以后，《人民日报》发表长文，悼念这位死于文革之中的大人物。作者也许不知道这个情节，文中没有引用此事来渲染文革的冷酷。也不知道陈家康的家人是否知道他是如何入殓的。

◇以革命的名义

不论何时，在中国谁都怕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这种事情竟然会有例外。干校里有一个公务员是复员军人，他不疯不傻，却长期主动给自己冠以“反革命”的头衔。事情传开，人人莫名其妙。原来，这位公务员先生是想用这个办法，达到离婚的目的。那年头，双方感情不和、一方移情别恋、配偶身有残疾等等都不是离婚的理由。唯有政见不同：一个要革命、另一个是反革命，才能被批准离婚。因为，只要是“人民内部矛盾”都必须“求大同、存小异，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之后，言归于好。当反革命不但自己有受不尽的苦楚，还要累及九族。他人避之唯恐不及，这位老兄为什么要引火烧身呢？也许是“爱情价更高”？

从批判会上我们得知，几年来，他私刻公章、伪造证明文件，发送给他家在农村的妻子和当地各级政府，说自己是“现行反革命”，让妻子与他离婚，并请各级党的组织监督执行。谁知他娶的是一个“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的烈女。他不相信丈夫会“失足落水”，就到北京来问个究竟。那公务员所在单位费了一番周折，才弄明白原来是自编自演的独角戏。

这里不被当局容忍的是：那公务员要化离身为贫下中农的妻子，那是对工农联盟理论的否定：他一定是另有所爱，才如此丧心病狂，不惜给工人阶级队伍抹黑。当时，即使有人想到，可能是婚姻不睦，搞得他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也不敢违背凡事都要先“上纲上线”，再分析、解决的常规。于是，对这个自掘坟墓的公务员，进行了内查外调，始终没有发现他喜新厌旧的证据。热衷其事的那几个人，又缺乏想像力，胡批乱骂之后，久久不得要领，最后不了了之。

◇中国保尔

为离婚而不择手段、授人以柄说自己是反革命，说到底还是以革命的名义；同样，为求爱也可以引经据典、化腐朽为神奇。校部有一个身材高大、络腮胡子、声若洪钟、仪表堂堂的青年。他姓杨，不到三十岁，已婚。平素心仪集“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于一身的苏联传奇人物保尔·柯察金。那是一部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有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为苏维埃政权奋斗、出生入死的经历和几次恋爱的动人故事，在中国社会上广为流传。

杨某是个风流种子，老婆不在身边正好施展手段。他看中了我们茶厂连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便向她示爱。那少女不愿把自己的初恋浪费在一个有妇之夫身上，就明白地回绝了他，杨某竟理直气壮地对那女孩儿说：“保尔可以有两个爱人，我为什么不行？”真是时代的名言，堪称千古之绝唱。如果有人编辑“文革辞海”，一定要收进这一条。

◇敌与友

一位好心的“五七战士”陈慰德，看着我们这群辍学少年，整日被人驱使着拉沙土、盖房子，学业全废，还自以为真的参与了什么伟大的事业，颇感惋惜。他主动接近我们，给我们讲读书的乐趣，启发我们的求知欲。我和另外几个男生被他吸引，一有空就往他的宿舍跑，听他娓娓而谈。谁曾想，没过多久校方就正式通知我们几个，说陈慰德在用小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拉拢我们，因为他本人就有政治问题，“不许再同他来往！”

那时候，不用说人们之间的交往无不受到监视和限制，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也都在周围“革命群众”的注意之下。校部一个男生通铺宿舍，有人发现，一个名叫夏禹文的人，经常在夜间戴着耳机用半导体收音机听“美国之音”广播。这在当年可是一项严重的政治罪行，叫做“偷听敌台”。

那个连的领导为了“掌握证据，教育群众”，对公开揭露此事做了周密的布置：他们安排与夏紧邻、睡在他旁边的王端瑚向夏发动突然袭击；再指定几个人准备好批判夏禹文的发言。一切就绪后的一天晚上，夏象往常一样脱衣就寝，在被窝里戴上耳机、打开半导体、在短波波段上找到“美国之音”，悄悄听了起来。他哪里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监视之下了。王端瑚让夏某先听上一阵，渐渐入了神、放松了警惕。然后他忽的翻过身来，猛然将手伸进夏的被子、一把夺过那个收音机。王端瑚一面唤醒大家、一拔掉耳塞、开大音量，全屋都听到了“美国人的声音”。这时几个膺命在身的人，各司其职地组织起群众，把个夏禹文斗的七荤八素。

◇ “八九点钟的太阳”

一次，我随几个“五七战士”上山采茶。我所在的一组有四个人：我，算是小五七战士；三十岁左右的王叔叔，是一个踌躇满志的“运动积极分子”；四十出头的束阿姨，她正因“五一六”问题被追查，前途凶多吉少；年近花甲的胡伯伯，是个老干部，本已官至副司长，不知为了什么问题，非但丢掉了“顶戴花翎”、而且看不到一丝“重返历史舞台”的迹象。

我们一边采茶、一边闲聊，束阿姨问道：“你今年多大了？”我正待回答，猛然想起昨天是我十五岁生日，要不是她问到我的年纪，现在我还忘记着呢。于是我说：“昨天我就满十五岁了，今年没有人给我过生日，你要是不问，我都忘了。”我那时“少年不识愁滋味”，这个回答无埋怨之意。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们都知道我的父母已经被隔离审查，我有好几个月不曾见到他们了，一时他们三人默然无语。如今回想当时的情景，颇有几分意味深长：胡伯伯首先打破沉默，他语带安慰地说：“你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呵。”对此，王、束二人表示同意，依此类推，王叔叔“是中午十二点的太阳”。束阿姨赶紧自谦道：“我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胡伯伯见状又苦笑着、操起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说了一句：“那我就是月亮罗。”我那时并不懂得这语中的禅机；王叔叔应当是会意的，但他只有微笑而已。

“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语是有来由的，它出自毛泽东对留苏学生讲的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这样的话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激动人心的力量，我那时真诚地等待着世界属于我的那一天。然而，它没有在我生命最美好的时光中到来。

“五七干校”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步，按照中国的算法，十五岁就是青年了。1970年，我十五岁那年的年底，我离开虎踞山、戴着“知识青年”的桂冠到北京郊区农村插队落户去了。因为，毛泽东还有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也许，这才是“世界是你们的……”云云确切的含义吧。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定稿于维吉尼亚

~~~~~

【往事如烟】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插队诗抄之五

• 邢 奇 •

〔作者前言：“……诗作大部份是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时写的，我从1967年11月至1976年3月在锡盟东乌旗满都宝力格牧场（曾改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插队诗抄之四载于z k 9 7 1 2 a ——编者）〕

### 冬日生活

#### 冷

天亮了，缩头又探脑。  
数数数了真不少，几次想起决心小。  
我再把牙咬。

骂声鸟，毡靴太冰脚。  
别忙收拾和打扫，先要生火烤一烤。  
粪是宝中宝。

粪太缺，烤火要节约。  
天上无云风声歇，门前雪山现数叠。  
谢谢老天爷。

#### 冬

放牧多年，都患关节炎。  
没有粪烧包中寒，包顶穗穗霜悬。

皮毡压在上边，负重才能安眠。  
却觉脚下还不暖，请人压上案板。

#### 拾粪

牛粪真多，很快捡一车。  
拉到家里一添火，顿时火苗低落。

取来存粪琢磨，对比忽然一乐。  
原来捡的是冻的，真是傻蛋一个。

#### 一声怪叫

一声怪叫，惊飞老A觉。  
抄起手电忙一照，只见小D乱跳。

手插皮裤弯腰，伸到膝盖直掏。  
掏出二人一瞧，是被耗子咬着。

#### 初冬未雪已寒

初冬未雪已寒，井边饮马艰难。  
冰上提桶步蹒跚，井口又小又圆。

忽然一下玩完，失脚要坠深潭。  
皮袍壳住人空悬，两手乱抓井盘。

### 驾牛车

买粮回去顶寒风，车尾煤油挂数瓶。  
穿过苇林瓶子破，煤油不化呈砣形。

### 爬犁

爬犁虽小，坐人还挺好。  
二人同行真不巧，一马刚才逃跑。

前面骑马心焦，无奈人沉路遥。  
后面人把鞍子抱，满脸都是苦笑。

### 雪上行（一）

风从背后绕前旋，雪粉上翻扑面粘。  
两筒毡靴耕雪野，一只袍袖掩鼻尖。

### 雪上行（二）

踏雪毡靴不易行，脚跟越走越前拧。  
蹒跚回首看足迹，八字撇横捺也横。

### 美食

炉盘烤肉响吱吱，此乃人间最美食。  
三碗米茶出牧去，毡靴就手揩羊脂。

### 肉片纷飞

肉片纷飞，小D热汗挥。  
发明做馅新方法，冻肉可用刨子推。

包子饺子进嘴，这月伙食真美。  
不到半冬肉告吹，大家一齐喊亏。

### 一寸一刀

一寸一刀，红肉白膘。  
倒进锅里一红烧，满包香气飘飘。

忽然包外马叫，原是马群来到。  
牵马回来一瞧，红烧早成黑焦。

### 准备过春节

满天风雪一月末，眼看春节要来了。  
心里盘算怎么过，脑子渐渐出轮廓。

学生风格要独特，不比摆设比利落。  
毯子遮住被子破，割草再把扫帚做。  
每月十三不算阔，也要省出买年货。  
各包聚餐挺不错，只是碗少难请客。  
两袖清风绕胳膊，坎坷不减眉间阔。  
学生历来有其乐，穷日子当成富日子过。

### 罐头

草原成年吃牛羊，春节要把猪肉尝。  
买来罐头嫌太凉，别忙，暂且放在炉子旁。

酒过三巡声响亮，猪肉崩到包顶上。  
欠脚仰脖都亮相，真棒！就是舔着还挺烫。

### 油灯半暗

油灯半暗，小D在扯淡：  
北新桥里倒铁链，岳飞真灵再现……

连说带表演，仿佛亲眼见。  
脚丫飞处灯一闪，顿时一片黑暗。

### 白雪擦身

白雪擦身，方显出，日本块大。  
同志哥，你莫害怕，本事白那。＜注＞  
名声噪世队外知，药箱随身肩上挎。  
耸鼻梁眼镜一耷拉，方开啦！

出远门，骑大马，药箱开，针灸扎。  
有健身之道，现身说法。  
嘴想逞强多说话，牙不争气直打架。  
看浑身疙瘩像鸡皮，哈哈！  
＜注＞白那 蒙语：有。

### 插青之夜

- 一、顶毡已旧补丁多，扭扭歪歪破烂窝。对卧灯下读经典，共入心中理想国。
- 二、灯芯用尽又需添，袄袖磨残好取棉。冬夜静读羊粪旺，氤氲暖气淡蓝烟。
- 三、解衣虱子匆匆爬，凑近昏灯紧着掐。头发滋啦糊一缕，忙抄剪子去灯花。
- 四、冬夜羊边晴便闲，孤包振翅自由天。听君神扯八千里，我坐粪箱把火添。
- 五、铁皮炉子熊熊烧，外队知青来串包。坐卧神聊未尽兴，齐声吼唱半通宵。
- 六、夜半包中齐吼歌，青春宣泄如疯魔。词生难以开喉唱，抓住尾腔可劲拖。
- 七、歌瘾来时困意没，吹灯仰唱任发挥。合声洪大无梁绕，直冲天窗缝隙飞。

### 通信

相隔千里难通邮，寄到北京需两周。  
往往回音更缓慢，三封来信一回收。

### 寂寞

头上青天脚下草，莽原空旷吾庐小。  
一片静悄悄，独守蒙古包。

忽见南边人影冒，忙登牛车作远眺。  
人向西北影渐消——来客又没盼到。

### 探家

身背羊肉步踉跄，车站才出受打量。  
误被纠察当小贩，劈头拦住问端详。

### 冬末

风渐不寒雪渐消，搜寻残雪费多遭。  
化得雪水土黄色，粪蛋草棵紧着捞。

### 搬家（一）

陶包小，五更寒，路程远，搬家难，  
搬到还要铲羊盘。  
老牧民，总在先，我没搬到已冒烟。  
学生车，不禁颠，坏了更要费时间。  
晚到不要怪牛懒，学生车少东西满。  
君不见，一翻山，老牛喘。  
灯前放下碗，谈笑忆风险。  
粪少不能再取暖，  
想到明天磨老拳：找牛粪，要快捡。

### 搬家（二）

睡眼惺忪，吃饭只匆匆。  
为要搬家走远程，  
拆包闹五更，两脚一溜风。

微风扫晨星，两眼渐分明。  
羊如潮水车如龙，  
万山腾起处，一点朝阳红。

路远车不轻，牛乏不肯行。  
还是闲人有诗兴，本人哪里有心情——头牛又要停。

### 搬家组歌（四首）

## 一、准备

拉锯扯锯，南来又北去。  
满眼犹白风未暖，次数已不胜计。

忽然又令转移，路贯牧场两极。  
收拾破车六辆，权当战备演习。

## 二、第一天

停车且喜早扎寨，谁知命蹇事多乖。  
外队有人想发财，打狼夹子雪里埋。  
老牛路过中圈套，小狗上当叫声哀。  
黄昏雪花潇潇下，阴云蔽月天不开。  
夜半风向南转北，倒灌白龙进圈来。  
移车转圈累三遍，抬眼忽惊东方白。  
头天搬家竟如此，明日行程没法猜。

## 三、第二天以后

脚下耳边眼底，雪厚风猛草稀。  
举队向南移，我也牵车前去。  
前去，前去，路见弱羊倒毙。

## 四、搬到

朝朝暮暮，赢得家南度。  
我有一言请记住：天无绝人之路。

路从脚下踩出，雪里开辟通途。  
经过斗争取胜，才是最大幸福。

## 天亮要把家搬

天亮要把家搬，车少实在为难。  
近邻新添车一辆，昨天答应分担。

五更面袋在肩，天黑方向走偏。  
走到天黑看出包，揉腰一劲说冤。

## 蒙古包

- 一、荒山野岭把包搭，平地立门便是家。拆包又向远方去，留下空盘迎早霞。
- 二、案板茶壶水桶勺，灯盆锅碗粪箱刀。插青家当只如此，炉子一浇便拆包。
- 三、拆包先解围包绳，初是哧哧后是砰。包顶内翻成碗底，始知绳子莫先松。
- 四、搭起毡包紧靠坡，忽然连日雨滂沱。潺潺流水穿包过，直是人家尽枕河。
- 五、铺毡盖地即当床，毡下草根生命强。拆散圆包人又去，一圈贴地草芽黄。

□ phlxl@gauss.bwh.harvard.edu 推荐

~~~~~  
【四海翻腾】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红卫兵与“全共斗”——兼谈60年代日本的新左翼

• 桥爪大三郎 •

一、文化大革命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则

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奇妙运动。说它奇妙，是因为它不该发生却实际发生了。

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论述，近代政治革命包括、也仅仅表现为资产阶级市民革命以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类型。中国在经过艰难曲折的革命后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然而，这样的党和国家却受到造反的无产阶级大众的批判打倒。不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而言，党是无谬的，正如天主教徒认为罗马教皇是无谬的那样。实际上，罗马教皇也可能出错，但因为罗马教皇的意志是决定对错的标准，因此他即使错了也得权当没错。如果理应无谬的党也被批判、被打倒，那么人们必须相信有某种比党更具权威的标准。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实现，意味着人们相信有凌驾于党之上的权威。

如果说苏联共产党曾经像俄罗斯正教的教会那样，是创造教义、生产正统性的组织，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是家产制组织（韦伯认为传统中国的科层制也是这种组织的典型），在这样的组织之上有皇帝之类的权威中心并不是不可思议的。毛泽东逝世之后，邓小平继承了他的位置——因为中国共产党官僚机构的运作离不开那种权威中心。

我们不妨具体探讨一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这里，首先必须从中苏论争谈起。中国共产党是作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而成立的，在形式上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然而，导致中国革命成功的，并不是脱离实际的共产国际的指导，而是毛泽东确立的中国独自的革命方式。因而，苏联共产党的指导与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龃龉的表面化，就是中苏论争。

中苏论争的原因可能有种种解释，中国民族主义的发泄也可备一说。无论如何，中国给苏联贴上了“修正主义”的标签，这等于公开承认理应无谬的共产党也会犯错。在此之前，苏共对斯大林的批判，也无异于承认党的错误。

其次，由中苏论争衍生出以下结果：第一、出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具有指导世界人民的权威和正统性的主张，因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革命思想是绝对正确的。随着中苏论争激化和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毛泽东的权威必然越来越加强。第二、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必须扫除修正主义（苏联的影响）的危机意识。如果党也曾犯错误，那么必须凭藉毛泽东的权威加以监察。从而，通过与党组织不同的渠道来发挥这种监察功能就变成是题中应有之义。其结果是，作为毛泽东的权威和群众之间的纽带的另一种“先锋队”——红卫兵登上了历史舞台。

让我们来考察红卫兵运动的社会学特征。

第一、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根据共产党的原则，党内的路线问题需要通过论争来解决；在论争开始之前，没有谁是先天正确的。除了上下级的区别，党员（个人）都是对等的——唯其如此，才有争论的可能。但对红卫兵来说，他们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打倒阶级敌人为目的，故此论争之类显得无关宏旨。事实上，红卫兵亦缺乏应付论争的知识和社会经验。他们之所以能承担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完全是因为崇拜毛泽东，从而超越了党员（个人）。在他们看来，毛泽东的正确性是既定的、不容论争的。他们的斗争方法是着重显示对手的非对等性（采用一切手段来侮辱对手）。

第二、红卫兵不具备自己独有的组织，他们是在学校、单位、地区、城市等制度性框架中组织起来的。红卫兵虽然反对既存的党政组织，但又以上述方式依附于它们。红卫兵组织不能具有全国性或跨行业的形式，它们只能透过上层的调整才能实现联合。如果由毛泽东来领导这种调整当然不会出甚么纰漏，但问题是他不可能兼顾那么多的红卫兵组织。因此，最终出现了红卫兵组织之间的武斗。由于红卫兵组织无须经过论争或论证就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而这种思考逻辑所带来的唯一结果就是把对手一概予以否定。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年内，应该打倒的既存组织还在运作，这时红卫兵还有斗争目标。但是，当既存的组织后来被彻底打倒，剩下的只是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互相冲突，最终的结果是混乱和无序的不断蔓延。

第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完成使命的红卫兵要被下放到农村。他们既然信奉毛泽东的权威，也就无法违抗这一指示。红卫兵自身未能建构一种与革命组织不同的、并且取既存组织而代之的制度，所以，他们在制度中的位置只能由上层的指示来决定。他们是既存组织的破坏者，在城市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结果只有被送到农村。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破坏既存的组织→下放，这就是红卫兵三个显著的社会学特征。

二、日本新左翼的谱系和思想

1969年1月，东京大学在日益紧张的气氛中迎接新年，其正门上装饰着毛泽东的肖像。面积宽广的本乡校园（这里聚集法、经、文、理、工、农、教育、药、医等九个院系），除了附属医院等部分区域外，完全被学生占领和封锁了。张贴毛泽东肖像的，或许是占据了正门附近的工学院陈列馆的ML派（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毛泽东思想派）。1月18日至19日，警视厅机动队冲进校园内逮捕学生，电视台向全国实况转播了事件的经过。安田讲堂的攻守，是东大自1968年6月15日起斗争扩大到全校的高潮。

不仅仅是东大，全国主要的国立和私立大学几乎没有例外，都在1969年初被“全共斗”（“××大学全校共斗会议”的简称）的学生占领了。当时我是大学二年级（教养学系）的学生，也参加了“东大全共斗”，处于运动的旋涡之中。根据我个人的体验，东大的斗争既有与外国共通的因素，也有日本独自的特征，是两者混合在一起的运动。

所谓“全共斗”究竟是甚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概观自1960年前后以来蔚成一大势力的新左翼。

日本的左翼，大体上可以分为日本共产党系统和劳农党—日本社会党系统。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一样，是作为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而建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鼎盛期也不过有数千名党员而已，不久就在特别高等警察的彻底管制

下濒于瓦解。尽管如此，该党在日本知识界一直保持着决定性的威信和影响力。

战后，重建的日本共产党由于得到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支援而迅速发展。后来由于清共运动，日本共产党一度被迫以非法的街头武装形式活动，但是从50年代中期起便放弃了这种路线。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活动家脱离日本共产党，结成了几个小集团。他们的宗旨是：试图形成真正的先锋党，用以取代革命的叛逆者——日本共产党。

在这种背景下，1960年发生了“60年安保斗争”。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主要的工会等日本革新势力，为了阻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改订，在国会内外开展了强有力的反对运动。在国会两院中占多数的自由民主党采取“强行表决”的方式与之对抗。连日来，以“全学连”（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连合，是全国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的联合体）为中心的数十万人的示威队伍高呼“反对安保”的口号，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在条约自然生效的6月15日，运动达到高潮。

当时的“全学连”又分成主流派和反主流派。指导主流派的，是志在世界革命的“共产同”。“共产同”是一个凝聚日本共产党过去的活动家、托派份子等各派系的组织。

三、“堆积的一代”与大学的大众化

60年代的日本，不断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迁。1960年的“安保”斗争，使学生和一般民众都产生了可能被卷入战争的危机意识。但是，以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为点睛之笔的高速增长期，很快就把上述的危机意识冲淡了。一般市民因为能享受到繁荣的成果而感到满足，也不认为越南战争会危及自身；结果，70年的“安保”斗争变成了一场单以相信革命形势大好的学生为主体的运动。

学生的社会地位在这段期间也发生了变化。1960年前后的大学生普遍具有作为精英的自负，并赢得了相应的社会尊敬。但是，由于整个60年代大学的升学率急剧上升，并与战后的生育高峰世代（所谓“堆积的一代”）的入学时期相重叠，结果使大学里充满了前程未卜的学生。他们一生下来就陷入竞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既对社会持有怀疑的态度，同时又受到高速增长带来的消费文化的影响。他们已经不能用战后时代的理想主义来约束自己。于是，“全共斗”召唤了这样一代“不规矩”的青年。

60年代的大学犹如各种思想搅拌在一起的坩埚，马克思主义这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以“共产同”系统的思想家吉本隆明、革马派的领袖黑田宽一为首的日本人士的著作也赢得了读者；存在主义、新小说等法国的流行思潮也成为显学。在文学方面，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等人的小说十分风行。

当时，一般学生都不大信任日本共产党，而与新左翼也保持距离。因为他们既不清楚各派之间的区别，又对这些派别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勾心斗角的做法不以为然。

然而，为甚么日本各大学在1968年及次年，竟会纷纷成立“全共斗”，并且获得学生的广泛支持呢？梳理一下当时的社会脉络，可以归纳以下一些理由：首先，“全共斗”是一场由那些与特定党团、宗派等保持距离的一般学生所推行的运动。它是大学为单位组织的，因而参加者的心理障碍较少。其次，“全共斗”提出的要求涉及学生的切身利益（例如要求取消学生的退学处分、让学生自己管理学生宿舍），完全不必考虑繁杂的路线论争。第三，“全共斗”归根结底还是带有左翼色彩的运动，这与当时的大环境（70年“安保”斗争）互相呼应。第四、“全

共斗”断然无视程序合法性，具有实力斗争的一面。第五、“全共斗”也是一场学生对自己本身存在价值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伦理运动。

“全共斗”是由一般学生推行的自发性运动，这一点与同时期的欧美学生运动相似；但它亦有日本独特的（也许完全是别具一格）组织性特征。以下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

四、“全共斗”是对民主集中制的逆反

60年代，许多学生都对日本共产党的组织素质——上级一声令下就可以造成昨是今非、方针反转——抱有反感和厌恶。新左翼各派虽然反对日本共产党，但在组织原理上如出一辙。例如革马派，一方面标榜反斯大林主义，另一方面却采取与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相同的组织模式。“全共斗”的活动却与之背道而驰。

“全共斗”的运动，一般都是由某个偶然的机缘自然而然发生的。它与新左翼各派处于相辅相成、若即若离的关系之中。试以东京大学全共斗为例来说明这种关系。

“东大全共斗”是1968年夏天结成的，导火线在医学院。在医学院，学生和教授会之间就无报酬实习制度的存废问题，几年来一直存在着对立。由于教授会决定处分数名学生，包括“共产同”的活动家在内的学生们在1968年6月15日占领了安田讲堂的钟楼——它是东大的象征，也是大学的中枢所在。大学当局仓促要求警视厅的机动队来镇压学生。机动队的数千人员在6月17日凌晨进入东大校园，这时学生们已经逃散。

当“机动队进驻”的消息传开之后，以前无动于衷的学生们也立即罢课，源源不断地聚集到钟楼前，人数约有六千，占东大学生总人数的一半。“作为学术自由的要塞的大学，岂容警察侵犯”的意识尚未泯灭。以该日为转折点，局部纠纷一举演变成全校性的大事。

东大十个院系的学生大会或代表大会，接连作出了罢课抗议的决议。日本共产党系统的提案基本上被否决，通过了新左翼系统学生提议的更为激进的“无期限罢课暨街垒封锁”的战术。各学院各学科都成立了斗争委员会或罢课执行委员会。尽管这些组织中混杂着新左翼各派的许多活动家和拥护者，但是大多数学生迄未参加过任何学生运动。作为这些组织的联合体而成立了“东大全共斗”，由物理学院的研究生山本义隆（他本来是运动无缘的）担任委员长。“全共斗”领导东大斗争达半年多，次年一月被机动队驱出安田讲堂，以后逐渐解体。

在左翼的自发性造反组织这一点上，“全共斗”看起来与红卫兵十分相似；然而，细心比较两者的思想和组织原则，又可以发现许多不同点。让我们来证实这个说法。

当时，多数学生对日本共产党以及新左翼各派的引导（趁具体斗争之机扩大组织）和山头主义已经感到厌烦了，“全共斗”为了避免既存党派的干涉，特意采取了与它们截然相反的组织原则。这些原则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条：

①不确定谁是“全共斗”的成员。学生可以随时参加或退出“全共斗”。“全共斗”向大学当局提出的撤销处分等七项要求，是唯一可以被称作纲领的东西。“全共斗”举行甚么集会或活动，参加者就是“全共斗”。

②通过有关人员的讨论和全体一致通过的方式进行决策。在对某一问题作出决

定的场合，进行反覆而彻底的讨论，直到没有异议为止。不采取多数表决。原则上任何会议都公开进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③不存在任何上级对下级的指令。全体的决定要向各组织传达，但由于它不是指令，可以不服从。亦即是说，各组织、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判断是否要按决定来行动。“全共斗”归根结底只是自发的各个人的集合。

“全共斗”的组织原则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翻转了，这种做法是怎么想出来的呢？也许像天安门广场学生那样自发的群众运动的场合，这种组织原则是司空见惯的，但另一种可能性则在于日本的传统。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平安时代，僧兵们手持武器举行了满寺集会，然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与负责首都警备的武士们发生了冲突。从中世纪的僧兵到近世的农民起义的遥远记忆，也许在“全共斗”中苏醒了。

五、民主主义与暴力

“全共斗”对教室进行了街垒封锁，使讲课无法进行。它们后来更把战术扩展为“全校街垒封锁”，以致研究室和办公楼也关闭，大学陷于瘫痪。

封锁与其说是手段，毋宁说是目的。在60年“安保”斗争中大显身手的学生们，在经历了“挫折”和“变节”之后，岂不是都到企业里就职了吗？这种斗争无非是一片假象——多数学生这么想。因而，必须在自己具体的生活脉络中为变革而组织斗争，把学生们的生活场面转换成非日常的空间，为此，封锁是必要的。

基于同样理由，“自我否定”成为“全共斗”的口号——否定那个被上大学的考试浪潮所吞没、毫无反思地要当资本主义社会的齿轮的自己。这种集体性的自我变革运动，就是“全共斗”的含意。它不是政治运动，而是所谓思想运动。因此，尽管运动提出了具体的斗争目标，但始终无法与大学当局达成妥协。任何大学的“全共斗”均无例外，都得面对被机动队镇压而败走的命运。

另一个问题是，“全共斗”对暴力采取了甚么态度？

新左翼各派（除前沿派外）都反对日本共产党放弃暴力革命的路线，他们奉暴力革命为宗旨。于是，他们采取了头戴钢盔、面覆毛巾、手持木棒与警察机动队相冲突的斗争方式。投石块、挥木棒当然不能完成革命，但是人们认为这种战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全共斗”采纳了新左翼的钢盔加木棒的斗争方式。“全共斗”无限期罢课加封锁的战术，是以自治会的学生大会和代表大会的决议（反映学生多数意见的民主程序）为根据的。但是，“全共斗”批评学生自治会的做法是把程序绝对化，因而要求把一切权力集中到作为“战友”集合体的“全共斗”。即使“全共斗”成了少数派，也要凭藉实力把街垒封锁坚持到底。反对无限期罢课的学生都被指责为自我否定不够彻底者，因而“全共斗”的态度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正是这种决心和信念支持了“全共斗”的“暴力”。

可以说，“全共斗”的暴力矛头指向以下三个方面：①大学当局、②敌对势力（特别是日本共产党系统的学生组织）、③自己本人（否定自己的内心世界）。“全共斗”与共产党系统的学生也接连发生好几次冲突，但仅限于组织性行使实力，并没有发生过以个人为目标的无区别性恐怖活动。总的说来，“全共斗”的暴力是观念性的、象征性的。在这一点上，它与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实践真正的阶级斗争而投身武斗的红卫兵是不同的。

为了争夺70年“安保”斗争的主导权，当时新左翼各派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全共斗”抑制了事态的恶化。在新左翼各派看来，“全共斗”是发展自己成员的最佳场合，因而不希望与“全共斗”搞坏关系。在“全共斗”看来，示威游行和街垒是它们的拿手好戏，因而一旦有事能够派遣外来盟军（其他大学的声援队伍）的新左翼各派弥足珍贵。在这里，两者的关系是既相辅相成又互相限制。

由于“全共斗”是以大学为基础的运动，因此在被机动队扫地出门和全校复课后，便不能作为运动而存续。新左翼诸派遂抛弃“全共斗”，重新开展各自的运动。

六、赤军派、连合赤军以及炸弹集团

新左翼各派把70年“安保”斗争作为最大的政治目标。1960年的“安保”斗争没有导致革命，被归咎于先锋党未进行适当的指导。各派都自称，只有本派才能在70年发挥先锋指导的作用。

但是，1970年的“安保”斗争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首先，1970年的前哨战——“全共斗”运动溃灭了。其次，1960年改订的（需要国会批准的）日美安保条约在1970年自动延期，根本无须国会的讨论和表决。再次，此时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也与60年代的不同，它们已经无意认真进行安保斗争。此外，6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使国民得到满足，对于学生的革命梦想已失去了兴趣。最后，机动队的警备壁垒森严，把新左翼各派给完全压制住了。

此外，中核派、解放派、革马派等等的内讧也纷至沓来，各派的头头和基层活动家都遭到反对派的袭击，他们或被杀害、或负重伤。血腥复仇愈演愈烈，新左翼开始被看作可怕的杀人集团。各派要在大学里发展新成员已经很难了。至70年代，使人们与新左翼彻底决裂的事件接连发生。

最初是赤军派劫持约铎号飞机的事件。

一直呼吁全世界同时革命的赤军派，在山区进行武装训练时被一网打尽。于是，剩下的干部在1970年3月，胁迫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约铎号连同乘客一起飞往北朝鲜，试图逃亡，这就是约铎号劫持事件。由于在日本国内看不到革命的可能性，他们只有寄希望于巴勒斯坦和北朝鲜。

连合赤军的阿萨玛山庄事件带来了更大的冲击波。

1972年2月，由赤军派的余党和激进的小集团京都“安保共斗”合并而成的“连合赤军”，挟持人质一起据守疗养所——阿萨玛山庄，并与包围的警察队伍展开了枪击战。后来搜索发现，在山区地下指挥部中，竟然掩埋着多名遭到同志杀害的尸体。这一事件的特异之处在于：连二十人都不到的小集团，竟要认真准备实行革命（武装起义）；而且当中有人以革命牺牲的精神不足为理由，把另一些伙伴都杀害了。即使成为少数者也要追求革命的理想，以这样的新左翼逻辑推演下去，最终不能不导致上述结局。当一直同情新左翼的人们切身体会到这一点时，不禁愕然。

此外，还有三菱重工爆炸事件。

1974年8月，不知何人安置的手工自制炸弹，在东京大手町的三菱重工总部大楼爆炸，造成了八人死亡和大量的负伤者。经过侦查，逮捕了人数不多的无政

府主义集团——“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犯人中有一个是我的初中同学，他因“全共斗”的影响而较晚进大学。由于要拒绝资本主义社会，又要独善其身和自我净化，这两种情感促使他参加了无区别性恐怖活动。不择手段地把自己的信念付诸行动，其结果是使他成为爆炸犯。自己的信念真是那么正确的吗？从此，不少人开始怀疑左翼的价值观、世界观。

可以说，这一连串事件断送了新左翼、“全共斗”之类的“左派”的前景。

在60年代的日本，红卫兵的文化大革命得到了肯定。人们误认为，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有革命的可能，那么一定是来自与僵化的党政官僚进行斗争的不断革命的抱负以及每个人的自律意志。但是实际上，文革不过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个人崇拜的产物。在新左翼和“全共斗”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被认为是当然的前提，因而文化大革命的实情是始料不及的。

七 红卫兵与新左翼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日本的新左翼及“全共斗”之间，虽说是相似点少、不同点多，但由于同处一个时代，还是可以找出一些共通之处。

第一、两者都以美苏冷战结构为前提，对苏联的作用表示异议。

有关中苏论争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本文一开始已经述及。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依次尝试了三种经济发展的策略：①向苏联学习→②自力更生→③引进外资。文化大革命（即最大限度地利用存在于中国国内存在的权威的尝试），发生在第二个阶段之中。

冷战（美苏力量均衡）是一种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公式的事态。新左翼不仅否定日本共产党的权威，而且也否定苏联共产党的权威。由于美苏搞均衡，苏联（看起来）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目标。所以，新左翼有必要强调自己的正统性——这就是反斯大林主义。可是，中国对批判斯大林持保留态度，实行斯大林主义。不过，在否定冷战中苏联的正统性这一点上，它与新左翼相同。

第二、与前一种倾向相对应，反美的因素相对弱化。

在文革初期，中国试图把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扩大到全世界，并描绘了以第三世界包围发达国家（美国）的世界革命蓝图。当毛泽东认定苏联为主要敌人而决心恢复中美外交关系后，这一图式被修正。这意味着中国优先选择民族主义，而牺牲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对于一旦日本和美国结成军事同盟，日本革命就几乎没有指望这样的事实，日本的新左翼似乎没有进行正面的研究。赤军派通过蜕变为国际游击组织的方式，实际上放弃了日本革命。其他各派，则把革命前途渺茫的现状归罪于异己党派的反革命的背叛行径。如果冷静地加以思考，把阶级斗争与反美民族主义相结合，不失为日本革命的一种可能性。但是这与日本共产党的路线雷同，所以未被各派采纳。

第三、两者都是仅仅基于群众造反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既打倒了严格按照计划经济教科书行事的苏联派和修正主义者，也打倒了尝试市场经济实验的走资派和现实主义者。在美苏对立的夹缝中经营国家的党政官僚，只能在上述两种可能性中进行抉择。如果把党的机构完全破坏了，那么正确性的标准必然取决于超越党的毛泽东，以及拥护毛的领导的一般群众。的确

，毛的指示和权威是自上而下的，但是如果没有群众的拥护，它也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力量。

“全共斗”否定了党派（先锋党）的存在价值，但它相信革命的理想。因而，群众只有在没有党派领导的状况下自发奋起。这样的群众，只有在大学里才找得到。

由此看来，无论是红卫兵的文化大革命还是日本的新左翼、“全共斗”，都可以被视为在世界革命的能量为冷战之壁所阻隔的期间，在一国内部追求纯粹的革命理想的运动。然而，两者都因脱离现实、缺乏革命的条件而自消自灭，在整天热衷于暴力活动的过程中失去了人们的信赖。

□ 季卫东译 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六年八月号·第三十六期（本刊有删节）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国）	< cnd-cm@cnd.org >
本期 校对：	尚琳（英国）	< cm-ee@cnd.org >
读者技术咨询：	荣刚（美国）	< cnd-help@cnd.org >
网络技术维护：	李建民（澳大利亚）	< cnd-info@cnd.org >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 cnd-cord@cnd.org >
《CND》总编：	熊波（美国）	< cnd-manager@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SUB（或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N.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SUB（或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ftp://cnd.org)[207.151.78.100]：pub/hxwz

或 [canada.cnd.org](f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